

论城市游击战

卡塔尔 著
红砖厂青年报 VOY 译

《批斗会》：本文作者观点与本刊观点一致，且不代表美国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观点，尤其是国外任何组织和个人的观点。我们不主张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的权威，发表本文的目的仅是为了进一步展开辩论。这些观点不一定反映我们支持或提及的任何组织的政治路线。

“至于欧洲的武装行动，我们看到了持久的武装斗争。它们是客观现实的表达。因此，任务不是谴责他们，而是要理解、研究和分析他们，看看他们如何表达旧欧洲也存在革命形势的事实。除此之外，还要看到那些拿起武器的人，他们认识到这是夺取权力的唯一途径。这是对修正主义的有力打击，因为在欧洲，修正主义的堡垒之一，修正主义开始被抛弃。无论斗争达到什么水平，还有多少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斗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与贡萨罗主席的访谈》，1988年

引言

关于人民战争理论，它的普遍性及其在地球上每个国家的适用性，都已经有很多讨论。对峙双方的辩手都将在辩论中谴责和捍卫城市游击战的经验。我们打算以不同的方式，即对数场重要的欧洲城市游击运动进行更详细的阐述，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更清楚地表明我们所坚持的毛主义的唯一立场：人民战争是普适的，我们建议研究挪威和德国的公开文件以对这一问题有更多了解。

我们发现许多讨论城市游击战的人并没有抓住重点：他们不是对特定现象，就是对马列毛主义缺乏了解。这一问题常得出各种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解释。

学习而非谴责

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急于彻底贬损欧洲城市游击战的整个时期。他们坚持认为，客观条件就是不允許，仿佛意识形态、毛主义本身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仿佛只要存在“革命形势”，持有任何思想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革命——不需要意识形态、战术和战略。更有站在右倾立场上的批评家们在总结哪些成功的过程中，无视从过去的失败经验中吸取教训的必要性。

最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民族民主阵线（NDFP）网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所持的右派观点。菲民阵因其在国际上支援修正主义的行径而受毛主义者的批评。为了指出这些最常见的右派立场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看一下它在哪里是正确的。确实，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直到1980年左右之前都没有进入战略进攻时期，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城市游击运动都达到其顶峰，包括诸如爱尔兰、巴斯克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等。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的武装集团，受到其自身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急速向战略进攻阶段迈进的客观条件的产物。尽管如此，这正说明贡萨罗主席坚持认为这些团体的存在说明了旧欧洲，修正主义的堡垒，现存的革命形势，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自然，我们坚持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进攻时代，无一例外地为各国革命创造了客观条件。

历史上，阿瓦基安和他的支持者对城市游击战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否定，这并不是为了坚持群众路线（他们已经明确拒绝），也不是为了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他们一直未能提供），而是为了灌输他们的长期合法斗争和短期暴动理论——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教条的和过时的观点，不过这也是

证明美国革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毛党的主要特征之一。尽管这种观点早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在美革共控制的《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杂志中流传，并被视为默认的常识立场。这一观点有别于在本文开头的贡萨罗主席所表达的革命乐观主义。美国毛主义者已经直言不讳地表示需要克服阿瓦基安主义的残余，这些残余仍然困扰着人们，仍然在右倾机会主义者中流行。

马列毛主义已经具备了所有必要的理论工具，对城市游击队的经验进行了冷静的分析、总结和综合。他们做对了什么？导致它们消亡的主要的理论和思想漏洞是什么？换句话说，它们的内部矛盾是什么？他们是如何正确和错误地应对自己的情况的？毛主义使我们能够避免不少城市游击队产生问题的地方，而非被其拖后腿。

通过这项简短的研究，而非全面贬损，某些品质就被显现出来了，这些品质对于任何主张在帝国主义中心进行武装斗争的人，无论其立场如何，来说都是最有价值的。只有那些把群众的武装斗争理论化（即人民战争）的人，才能克服城市游击队的错误，达到更高的高度。相反地，即使只是错误的战略，如对暴动的教条主义观点，也应当毫不妥协地被理解为试图取消武装斗争。我们的目的是坚持认为，双方的批评者都是从对城市游击的准确研究出发，而不是出于资产阶级的鬼话或对武装斗争的恐惧。城市游击的真相一直被浪漫主义和悲观主义所掩盖。让我们把迷雾至少消除一些。

意大利红色旅

“我们一直在打击人民的敌人，我们一直通过大量的斗争运动打击他们。”

——红色旅，米兰，1971

作为毛主义者，我们坚持意识形态不可放弃，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在这儿能够研究的各种组织中可以说发展出了最好的意识形态的城市游击队组织开始。红色旅更加善于明确表达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反对修正主义的立场等，也因此他们从欧洲的所有“马列主义”城市游击队组织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与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清晰、无可否认的联系，也因为他们存在于地上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和劳工斗争的串联，尤其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汽车工厂里。红色旅并非像他们的德国同志红军派那样主要有学生、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相反，他们主要是由工厂工人转为的士兵。

对游击中心主义的控告和它真正的劣根

红色旅不是游击中心主义者，他们甚至十分明确的阐明过。相反，他们依靠工厂基层作为“阶级斗争的直接表现”，这也为他们组织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尽管如此，他们依旧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要么受到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要么受到了作为游击中心错误例证的团体的影响。

红色旅从第三世界多渠道汲取斗争灵感，因此，他们有时转向了折中主义——他们对意大利共产党采取了正确且强硬的态度，同时也犯了巨大的错误，即把对能把谁团结起来的主要考虑，完全建立在对议会外武装斗争支持的基础上一—而无视战术、战略和意识形态。即使是那些对他们叫喊最凶的批评者，只要这些批评者在理论上对武装斗争持有某种模糊的支持，红色旅也拒绝指责。必须把这一点理解为未能让政治指挥枪——这是一个类似于游击中心理论主要缺点的错误。

红色旅深受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Tupamaros）的影响，乌拉圭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与毛主义者不同，图帕马罗斯将城市游击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在他们的辩护中，我们可以看出，毛主义在拉丁美洲还没有被认识到是一种力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坚持，在 20 世纪 60 年代秘鲁同志在他们的党出现左倾时，谴责游击中心战略是正确的。贡萨罗主席所持有的正确路线是重建秘鲁共产党并开始准备持久人民战争。图帕马罗斯的错误在于他们对客观条件作出了正确的反应，却没有对他们的主观条件作适当的准备（这与城市游击队的解散者对欧洲经验的描述正好相反），实质上，这也是红色旅的根本性错误。任何关于战后意大利的研究都揭示了让武装斗争成熟的的条件已泛滥成灾，武装

斗争并不是红色旅的错误。

过度借鉴图帕马罗斯和巴西人卡洛斯·马里盖拉的例子必然会破坏红色旅的潜力。尽管有这样的限制，但因其对无产阶级的依赖，通过依靠无产阶级的支持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更多的无产阶级的支持，红色旅仍完成了很多伟大而成功的行动。

通过武装对抗赢得大众支持

甚至在红色旅成立之前，他们的前身无产阶级左派（Sinistra Proletaria, SP）就在为无产阶级家庭组织住房斗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与修正主义者和合法左翼不同，无产阶级左派组织无产阶级家庭无视使他们迷失和陷入困境的法律途径，转而与阶级敌人进行直接的和武装的对抗。他们教导群众住房斗争是无产阶级夺取权力的斗争的一部分，并以此巩固他们对住房的占领，并准备应对警察的进犯，这导致很多警察都住院了。与修正主义者们的表演和布道相反，这些策略非但没有导致群众疏离的不赞成，反而增加了群众的支持，最后，住房委员会让步了，并把房子给了工人们。无产阶级左派评论道：

“他们[无产阶级左派在住房斗争中成立的工人委员会]战胜了修正主义者和所有其他鼓吹温和、只想依靠谈判、指责斗争中的人们是极端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人民的假朋友’。”各路修正主义者都说我们会被打败！但是我们成功了！人民的新法律获得了胜利！” [1]

当代对红色旅的评价

我们发现很少有关于红色旅的英文文献是从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他们的历史和经验；我们承认，我们还没有完全研究这一点，且我们必须与我们读到的（那些英文文献的观点）作斗争。最近加拿大学者、修正主义者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写了篇简短文章，尽管我们将讨论其中的缺点，但是它也有优点。在他反思 Kersplebadeb 和 AK 出版社（Kersplebadeb and AK press）公布的两本书：《打一教百》和《1978：一个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他正确地强调了红色旅所维持的群众联系和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左翼学者只关注意大利自治运动的趋势，这使它成为他最好的文章之一。但我们仍然面临着某些误解或可能的混淆，这值得纠正。 [2]

必须纠正的第一个错误是，认为红色旅试图发动他们从未宣称要发动的“人民战争”的观点。通过像“持续革命战争”或者“持续武装斗争”这样的观点与毛主义理论的持久人民战争的重叠或者类似，但这并不接近，不足以将他们的武装斗争称为真正的持久人民战争，甚至认为他们是在持久人民战争的范围和方法方面发起的一次尝试都不合适。我们可以对红色旅创造性应用理论，试图将类似于城市持久人民战争的东西理论化的观点，做出一些让步，但由于一些理论错误，他们未能正确地完成这一工作，我们将在下面概述一些理论错误。

毛主义的观点是，持久人民战争必须由共产党发起，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持久人民战争是不可能的，完全重建的党有尽快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的历史责任。红色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他们的辩护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武装斗争并不总是持久人民战争，即便后者总是包含着前者——历史证明，武装斗争可以先于党和持久人民斗争存在，这是必然的。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JMP）坚持认为，没有党是红色旅的阿基里斯之踵（致命弱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红色旅正在或者试图开展持久人民战争是缺乏支持论据的。只要说没有党就不可能有真正可信的持久人民战争的尝试就够了，但是在帝国主义的中心一定有武装斗争的经验，其中又有很多有用的教训，从这个角度思考对于将现存的武装斗争转换成人民战争是必要的，所以，党是先决条件。在某些时代，在某些条件下，尽管频率极低，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武装斗争总归会爆发。这些爆发必须用于持久人民战争的发起，而非糊涂的将它作为持久人民战争的替代。

红色旅相信他们会通过武装斗争建设党，这是错误的，很多党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建设起来的，其

中显著的有中共和秘共。起初，中共的成立会议上只有很少的代表，在全中国只有不到 100 个成员，按照毛的说法（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能回答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但是它仍然经历了指数级的增长以及几乎毁灭和劫后复苏——这全都是在和通过武装斗争和最终的持久人民战争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最显著的分界点就是，中共已经认识到并确立自己为先锋队。

另一方面，红色旅没有类似的党的条件，与“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建设党”不同，我们遇到的事实是他们试图主要通过城市游击队运动的方式建立或者重建党。在此，我们必须理解两个概念，建成（building）的概念和建立/重建（constitution/reconstitution）的概念。所有党都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来建成，没有任何党在开展任何形式的革命斗争后能够保持之前的质和量，因为一旦开始革命斗争，任何健康的革命党都会在党的建设过程中成长和丰富，这是贯穿整个党的存在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另一方面，建立/重建在党的生命中并不是贯穿党的不断发展的，重复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而是得以持续“建设”的必要先决条件，建立/重建一旦结束，“建设”就立即开始。把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不是语义学问题，而是一个原则上的错误、一个蒙昧主义问题，无论是否有意，都倾向于破产了的“通过长期的合法斗争积蓄力量”的观念。可以说，一个尚未建好的党，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无法建设，只有通过建立/建设，实现从非党组织到党，从党的雏形到真正的党的飞跃——这也包括将质的提高当做是首要考虑因素。

为了使问题清晰，党的建设只能发生在党存在的条件下，在这个条件之前，组织不是“党的建设”；是将其自身建立或重建成一个党。在我们看来，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的方案是一个随意得出的结论，限制了我们对红色旅错误的根源的探讨，这个根源是他们寻求的是一种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事物——在发动他们有时称之为“持久革命战争”后，他们建立或重建自己。此外，在武装斗争的条件下这也许有可能重建共产党，然而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拥有对党的正确概念，而这是红色旅所没有的。

这个错误的概念，再加上无计划的游击中心主义的影响，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在左翼城市游击队中无可比拟的潜力。通过战争来建设党是一个完全合理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几乎所有经验中都被证明是可行的，但是领导革命战争而没有建成的党，是不可能为阶级的夺权取得任何长期胜利的。

在文章的更新版本中，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改进了他的评价，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们的不同意见，因为这对分析红色旅非常重要，他总结道：

“对于那些熟悉秘鲁共产党“党的军事化”概念的人来说这甚至是一种倒退，因为这似乎是‘前党组织的军事化’ [编者：基于对这种比较的讨论，我应澄清，这主要是一种修饰上的差别，旨在表明当代的毛主义者对人民战争的理解优于红色旅对此的理解。很明确，在它的早期阶段，红色旅对其前党组织的“军事化”事实上是成功的，并为其带来了力量。确切的问题在于，当红色旅进入了战略防御的军事阶段，它还没有党的机构，并希望在内战中建成这样一个机构。更准确的说，红色旅在没有建成的先锋党的计划的情况下正式进入了军事阶段。] 在 1980 年代，也许因为缺乏一个可以控制枪的预先建成的党——而是用枪寻求发现党的过程——红色旅的不同纵队发生了分裂，因此导致他们在受到国家反革命的攻势时更加脆弱。不过，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是因为他们拥有革命遗产。我们应该从那些追求革命的失败了的运动中学习更多，而不是那些从未失败过的运动，因为他们从未尝试过。” [3]

我们认为，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并不熟悉党的军事化，至少不够熟悉。当然，他说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必须指出和纠正的是，这种在党的军事化本身上混淆。红色旅构想了党和军队的完全合并，强行使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具合二为一，这是他们在前党组织时所遵循的模式也是他们对未来党的看法。这与党的军事化是完全不相容的。正如秘鲁共产党所正确坚持的那样，党的军事化是为了领导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调整和修改。不论是秘共的理论亦或是他们军事化的历史经验都认为党和军队不可以结合成一体——即红色旅所理论化的战斗共产党。与这种构想和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的错误理解相反，秘鲁共产党构想并实现了军事化的

共产党，即围绕在党的周围同心建设党的军队——比党自身更大。党是最高政治指挥中心，少数人聚集在那里，通过军队，这个军队是围绕党进行建设的，人数多得多，能够进行群众工作。为了了解关于这一主题的更多信息，我们推荐巴西同志的作品和一位前奥斯汀红卫兵同志的讲话，他们正是在要求萌芽中的党的军事化。[4]

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的文章中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于前党组织的军事化对红色旅有利，而非有害的理解，然而他没能明确肯定党的军事化是马列毛主义的普遍组成部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解，因为，毫无疑问，一个非军事化的团体肯定无法做到红色旅所做的事情。这也为历史所证明了，除其他事外，其中最突出的是红色旅很少被渗透。虽然大多数的修正主义组织，其中主要的是意共坚持认为红色旅是一个警察阴谋，充满了告密者和渗透——这与事实正相反，意共才是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中含有美国中情局特工的那个，这些特工通过诡计设法提供情报，导致数以百计的意共的兄弟党派中的拉丁美洲人的死亡。

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美国的修正主义者中，他们坚持秘密行动的毛主义者是由执行现代反间谍活动的特工组成，这是毫无根据的指控，考虑到这些修正主义者享有警察保护，几乎从未面临重大指控或镇压，而那些以某种方式与毛主义运动有关联的人面临着近乎连续不断的指控和国家镇压，包括企图暗杀和不计其数的构陷、诱捕和监视等等。我们看到的是，那些由于组织而最易受渗透的趋于不会与政府发生冲突，也最少被分析；针对那些组织起来反对渗透和面临镇压的人，却去指控他们是国家特工，当然，这些指控永远没有任何事实证明。

只有部分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把我们对红色旅(或任何城市游击队)的理解超越一般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军事化的共产党与军队和党合并的区别，建立/重建和建成之间的区别。我们必须捍卫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建成军事化的共产党；我们决不能把党和军队混为一个整体。

为了进一步说明红色旅的错误，我们必须审查 1975 年的文件《对国家心脏的猛击》，它试图从理论上证明把党和军队混为一个整体是合理的，当然，通过武装斗争来建成党是要推迟到以后的：

“游击战争的群众路线并不意味着，像某些人解释的那样，‘在武装斗争的地带组织群众运动’或至少当下并不是这样。”

“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仍然是建成战斗性的党，作为‘客观的’革命阶级阶层的政治和军事所需要的真正解释者，在革命战争的众多战线上发展全阶级的战斗组织。”[5]

红色旅简洁地揭露了他们的主要错误，比当代或历史上的任何批评家都要好。在武装斗争地带组织群众运动是一项需要红军的严谨任务，只有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军队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党全方面地指挥军队，是军事化的但又是与军队不同的组织，这就是秘鲁共产党的总政治路线中所概述的革命三大工具的同心建设。

相反，红色旅把党和军队混为一个整体，试图把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作为一个追求，而不是作为一种客观必要性，从而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伏笔——游击战争或任何其他时期的群众路线都依赖于群众创造历史，党必须作为杠杆，领导群众的原则。人民战争要纠正红色旅的错误，剩下的就是从他们的成功中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从红色旅吸取哪些必要的教训呢

首先，要了解他们对现代修正主义意共、意共与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合作和在国际上的政治立场的观点。红色旅是无产阶级中一股真正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工厂内行动，直接反对企图破坏或粉碎车间斗争的意共干部，他们也反对残存的法西斯主义管理者和所有者，这在意大利很常见。这反映了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修正主义是共产主义斗争的主要危险，认识到意大利共产党是帝国主义

国家中最大的、最强的没有国家政权的修正主义组织之一。现代修正主义与革命的矛盾创造了红色旅，没有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就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在统一战线上就会屈服于上述折衷主义。在这一切中最闪耀的一点是，红色旅作为无产阶级的杠杆的能力，在反对修正主义统治和改良主义方面采取了大胆的、得到了支持的行动。

在军事上，红色旅谴责了第三国际的暴动战略和游击中心主义，这是正确的。红色旅从意大利武装斗争的悠久传统中发展而来。这些斗争包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接纳了修正主义后，大量的意共干部、基层组织以及激进的工人民兵仍然拒绝解除武装。它们具有持久的特点。对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者们来说，武装斗争并不陌生，这使得旧共产党的背叛更具毁灭性。反法西斯抵抗战争未能发展成为人民战争的失败是历史性的，这是陶里亚蒂和其他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叛徒的责任。

我们一定要清楚，被现代右倾机会主义者贴上“冒险主义”的红色旅的行动实际上是红色旅的功劳。他们的目标通常是最受唾骂的，有时他们会审判人民的敌人，树立典型，作为有意识的宣传行动，比如，剃掉一个法西斯管理者的头，把他绑在一家汽车厂外的旗杆上，脖子上挂个牌子。这些活动增强了斗争工人的支持，加强了他们的信心。数百名工人举着红旗在管理者成为红色旅目标的工厂内游行的情况并不少见。红色旅认识到，意大利无产阶级寻求武装斗争，而这种愿望正面临着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扼杀企图。

对试图在工人阶级社区和工厂里打击和抵制法西斯影响的现代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红色旅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教训。在二战后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他们作为最激进、最发达、最有力的反法西斯力量之一脱颖而出。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当代左翼分子却非常乐意穿肮脏的无政府主义尿布，不管现实多少次迎头痛击它。

从红色旅的组织方式中有许多重要的例子可供借鉴。一些激进分子被发现潜伏在反共产主义的工会中，而另一些则公开放弃他们的左翼观点，以便在进行红色旅行动时不被国家发现。与美国的地下气象员组织不同，红色旅专注于在保持和发展其群众联系的同时不被发现。任何严肃的革命者都应该研究他们所采用的能让他们发挥作用的方法。

武装宣传必须与“行动宣传”划清界限。前者利用革命暴力，争取群众支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形式。后者只是希望在没有组织表达的条件下，有组织地激发类似行为。我们可以理解，红色旅倾向于前者，而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后者。我们可以在秘鲁共产党对偷牛贼和强奸犯的早期审判中找到武装宣传的历史论据，这些人在人民法院审判完成后被处死。这些例子在迄今的每一场人民战争中都无一例外地出现，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发起持久人民战争的党和组织也能够为群众进行这样的审判和惩罚。必须理解，对罪犯的个别审判和惩罚本身并不会消除这种罪行的发生；在获得权力和革命政府能够实施统治之前，仍会有偷牛和强奸的行为，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将继续下去，一旦夺取了全国的权力，这些罪行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文化革命的对象。这种讨论的价值在于，这种惩罚的作用是动员和激励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对反人民犯罪的威慑作用只是一种附带好处。支配这一点的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只会加强对持久人民战争普遍适用的论据。红色旅特别擅长武装宣传，认为这有助于任何游击队斗争的第一枪。

红色旅研究革命理论的真正意图是将普遍性应用于意大利的具体情况；他们对意大利和世界的许多分析领先于其时代的，因此对所有革命者都是宝贵的，而其他理论则缺乏彻底的科学性。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使用陈腐的教条，坚决地同一切企图用无休止的合法主义来扼杀革命的人决裂，甚至他们的失败也比合法主义者（包括自治主义者）所谓的成功更有价值。红色旅没有在他们的理论上做得足够远，无法依靠正确的意识形态和军事战略。他们所缺乏的正是毛主义作为马列毛主义的完全理论化，他们只能创造性地运用虽然是折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证明了在欧洲进行武装斗争的能力。与他们的成功相关的是，意大利是欧洲列强中更落后的国家之一；它仍然保持着法西斯时期天主教会培养的高度反动，尤其是对女人，在南部依旧存在半封建分子和对北迁到工厂工作的南方人的广泛的种族主义。这些条件有助于红色旅成为最成功的城市游击队之一。仅凭意大利的这些

特点并不能使红色旅与众不同，是他们坚定的无产阶级倾向，和他们理论化和证明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问题的渴望是他们与众不同。这并不是大的飞跃，建议关心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武装斗争的人好好地研究和分析红色旅；这对于使他们免受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攻击是有意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试图取消帝国主义中心的武装斗争。在任何分析中，我们都应该认为红色旅在栅栏的正确的一边。他们的错误是革命者尝试新事物时的错误。我们应该在持久人民战争的脉络中珍视它，就像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对巴黎公社的观点。

红军派

关于我们的办法，我们已没有更多的话要对你们说了，就像我们的行动计划一样。——你们这些混蛋！……你说冒险主义是什么意思？那次只能怪告密者，不管怎么说。”

——红军派，《建立红军》，1970年

红军派引用的毛泽东比引用的其他革命者多得多，他们的某些理论源于毛泽东。其中主要的是最好理解为错误地运用正确的思想，或以错误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正如红军派那样，坚持把实践放在知识积累中的首要地位是正确的，这对于发动战争来说也一样适用——因为这一真理是理解红军派是武装斗争的伟大试验的唯一途径。从毛主义团结-斗争-团结的原则出发，红军派认为，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不可能将德国工人阶级与自己 and 进步的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资产阶级的观点，有时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是，红金派幼稚、浮躁，更像是一个帮派；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的了，但凡粗略地审视一下他们的理论，就可以看出他们高度关注马列主义理论，在伟人们中强调了毛。他们并非不关心具体情况，而是直接从对这些情况的理解出发，为自己的论点进行了高质量的理论辩护。

不像红色旅，红军派对维持和加强他们在德国无产阶级中的基础并不怎么关心，他们在他们最重要的文件《城市游击队概念》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最初的组织观念是把城市游击队和基层工作联系起来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社区和工厂工作……学习。很明显，这行不通。” [6]

通过否定三大法则（三大法宝）以及紧随其后的否定毛主义，红军派试图从理论上为军民分离辩护，而不是像红色旅那样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这一观点将持续不断的损害红军派，并且会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他们脱离无产阶级。

作为最有据可查的城市游击战团体之一，红军派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对待，我们只能接受最有限的概况。首先是它的特点，我们必须考察红军派的战士自我牺牲的一员，甚至放弃自己为人父母的权利，就像古德伦·恩斯林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那样，她们都是母亲，被迫在积极的母亲角色还是投身于地下战士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因为它生动地说明了当时德国女性的普遍思想，即武装斗争是确保一个光明未来的唯一途径。组成西德工业和政府首脑的前上层法西斯分子的存在强化了这一思想。对于构成红军派的激进一代来说，战前政府和战后政府之间有着很大的连续性。传统的共产党被不断推行的法西斯政策所取缔和摧毁，这一事实只教会了年轻人一件事：枪是唯一的政治手段。赞同这一点对了解红军派是必要的，对任何批评他们的提法是必要的，这些批评必须正确地对待他们。

与红色旅相比，红军派更像是一支没有党的“军队”。他们认为自己是第三世界武装斗争中的一个武装团体，因此，他们发现自己过于注重团结和支持性的行动，这些行动使他们在后勤上受益，例如，这种支持得到了黑九月（Black September）团体的回应。黑九月在慕尼黑奥运会上挟持以色列摔跤队作为人质时，将红军派的囚犯列入了他们要求释放的巴勒斯坦囚犯名单里。这种过度的关注也在后勤上害了他们，因为它无法参与德国工人阶级现有的斗争，从而损害了他们最宝贵的武器——武装的人民。

红军派有价值的是他们能在这些条件下一代一代的传承自己，如果他们获得了适当的群众基础，

拥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并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他们可能是不可阻挡的。我们再次看到好的客观条件和糟糕的主观条件。就他们能够成功完成并不受惩罚，以及从纳粹德国继承下来的监视和镇压等而言，他们在一个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游击战到了什么程度是值得注意的。所有这些都转化成了一个悲剧的事实：他们缺乏全能的、革命的马列毛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在重大暴力行动之前，《城市游击概念》一发表，西德国家就立刻开始动员力量消灭红军派。三千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就在德国北部城市巡逻，设立检查站，追捕红军派。革命者抵抗这种挑战的能力是惊人的。

那些希望用条件讨论来代替意识形态讨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最完全地忽略了这点。保守的观点不吸收任何教训，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完全放弃意识形态讨论，红军派之所以基本上失败，是因为德国的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红军派很好地证明了武装斗争在德国的有效性；他们也以自己为代价证明了，武装斗争必须遵循正确的毛主义意识形态，更因为意识形态的失败而非“糟糕的条件”，红军派永远不会胜利。

正如上文所说，红军派引用毛的话并不少见；他们甚至将 1972 年 4 月的文件命名为《为人民服务》，声称他们的武装运动在图帕马罗（Tupamaros）和黑豹党许多的浪漫化概念中为人民服务。我们可以承认，这种用武装斗争为人民服务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为人民服务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主要是通过总结他们的经验，采取大胆的宣传行动，这些行动迫使帝国主义国家放弃其民主外衣。实际上，在德国民众中进行的早期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红军派的早期行动普遍表示同情。即使在第一代领导人被捕后，这种支持对他们队伍的扩充也至关重要。然而，这种广泛的同情并没有得到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军派把自己当作一个代理人，这种背离在毛主义党的领导下是不可能发生的。红色旅在他们的行动中看到了成功，但对红军派而言，他们并不关心客观目标的完成（除了释放政治犯）。

红军派必须被看作是一次科学实验，这个实验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为了粉碎武装斗争所做的一切企图，当然也包括革命者可以做些什么来抵消这一点。为了对抗红军派，西德率先采用了现代刑罚隔离技术，但这只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并不能真正阻止红军派数十年来的武装行动。这就强调了敌人是战略上的纸老虎，却是战术上的真老虎的原则。在一个真正的革命党的指导下，他们的行动方式可以被重新讨论，并由一支真正的红军执行，从没收财产、绑架以及革命暴力的其他使用，红军派证明，经过党的调整，他们的方法可是被使用，且适用于任何城市地形。这些长期持续的事实证明，任何武装斗争都是呈现出持久的特征，通过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可以避免红军派犯下的很多错误。

如前所述，红军派主要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组成。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他们就会变得盲动并脱离人民群众。红色旅的优点暴露了红军派最大的缺点，后者在军事上同样老练。但是，要把这种组合看作是在斗争中好心但不正确的同志，而不是把它当作可憎的来全面反对。我们应当坚持认为，红军派因为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而犯了错误，但与此同时，面对着占主导地位的试图解除斗争武装的修正主义，他们又真正地推动了颠覆帝国主义。我们决不能做的是加入到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对红军派的谴责的大合唱中。我们的批评决不能像修正主义者，那些期待真正的错误来庆祝革命者被消灭的人。

就这一点，红军派指明了他们处境的客观现实——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夺取政权。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只有通过马列毛主义的执行，才能真正发挥其潜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纷纷谴责红军派和其他类似组织的经历，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放弃武装斗争。20 世纪 70 年代的物质条件导致了城市游击队抓住枪。确实，群众们大声疾呼，抓住枪，进行革命。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他们缺乏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加以谴责，那是不恰当的，正如，如果我们认为，在美国受压迫的黑人民族焚烧建筑物和抢劫商店对群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是不正确的。首要任务是坚持重建德国共产党，这样，组成红军派的年轻人就会得到他们的正确领导。德国的毛主义者承担起了党的重建任务，并出色地阐述了持久人民战争的普适性。他们的文件可以说明这一切，他们比我们更有资格评论红军派的经验，因此，我们只能提供我们可以理解的有限观点。

最重要的是，红军派证明了，即使是处于权力高位的人也不是防弹的，即使是在一个先进的帝国

主义体系中，他们也是脆弱的，这对每天被告知他们的敌人存在于一堵不可逾越的防御墙后面的无产阶级来说是有客观价值的。这种万能的神话被所有那些主张在现存体制下争取长期合法斗争、向公众“党派”开放的人所再现，和 20 世纪 70 年代一样，这种观点在今天破产了。对汉斯·马丁·施莱尔的绑架和处决至今仍萦绕在统治阶级的心头，这给我们提供了任何敌人都是可以触及的灵感。

综上所述，问题不在于谴责这些激进分子的明显缺点，而是为了庆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即使是有缺陷、架构不良的组织，也能在自己的国家打击和穿透帝国主义的铠甲。红军派通过自己和敌人的血证明了这一点。这一点应在分析和改进时，予以认识和重视。

尽管红军派从未充分阐明重建德国共产党的必要性，但事实证明，他们顽强、勇敢，有能力采取伟大的行动。与他们相对应，德国的合法左翼修正主义并没有提供任何一个有用的教训，那些只不过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失败的重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失败已经被理论论证了一百多年了。

爱尔兰共和军

“自 1916 年爱尔兰共和军成立以来，它就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强烈敌意并持续抵抗帝国主义的组织之一。爱尔兰共和军始终站在先进革命理论和游击战术的最前沿。”

——《爱尔兰共和军绿皮书》，1956 年

最后，除了名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之外，我们还必须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经验问题。北爱尔兰仍然被英国所占领。英国是一个古老的殖民主义国家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但是，面对着这个帝国主义巨人，爱尔兰共和军能够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甚至是那些谴责欧洲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城市游击队的人在对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评价时也非常克制。任何人都不能无视英国对爱尔兰人所犯下的残忍暴行，就像不能无视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一样。

爱尔兰是英格兰的首个殖民地，是帝国的试金石。因此，爱尔兰人民造反不断，总是在不同时期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反击。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麻烦（troubles）上，但是对于城市游击战的教训来说，我们绝不应该忘记半成功的爱尔兰独立战争，这是一场不能被敌人在军事上打败，不得不在政治上因国家的分裂而被击败的战争。这就是城市游击队诞生的地方。

消耗战还是持久人民战争？

爱尔兰共和军从以下五个方面阐述了自身的游击战略：

1. 以消耗敌军人员的为目标，尽可能杀伤敌军以便敌国人民要求撤军。
2. 炸弹爆炸行动旨在使敌人的经济利益在我们国家无法获益，同时限制其对我们国进行的长期金融投资。
3. 除了殖民地军事管制之外，使得北爱尔兰六郡在现在和过去几年都无法被管理。
4. 通过国内和国际宣传和报道运动来维持战争以及为结束战争获得支持。
5. 通过惩罚罪犯、通敌者和告密者来保卫解放战争。[7]

显而易见的是，游击战略缺乏发现于更为先进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所具备的必要技术；它对于如何将游击战争发展为真正的战争，对于如何通过动员人民和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来粉碎敌人军事力量并使得敌人彻底失败，没有适当的认识。整个战略取决于这样一种希望，即当交战的代价变得高昂时，

敌人会自行撤离。这种军事理论上的失误必须被视为一种短视，这导致了历史上的谈判、不合理的妥协和投降。

正如爱尔兰共和军所表达的那样，消耗战的结果取决于哪一方拥有更多的资源，在实践中，这往往会倾向于毛所警告的“消极防御”或“专守防御”，这是持久人民战争理论所说明和克服的错误。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在北爱尔兰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准确的说，爱尔兰共和军在其最终背叛和投降议会主义后，于1969年至1998年前后进行了一系列消耗战。主要的考虑是为了使得英国在承受民族解放力量所造成的苦难后再也无法忍受这场战争。这场消耗战承受的限制与持久人民战争必须怀有的考虑是重叠的，但与消耗战不同的是，持久人民战争的力量不断增强，不仅获得了群众的同情，而且从其对敌人及其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的能力中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通过其有缺陷的军事战略，爱尔兰共和军仍然能够在谨慎的平衡中进攻和防御，在这一过程中爱尔兰共和军能够开辟出一些飞地，作为群众支持的伪根据地。警察和军队害怕进入这些地区，共和军能够开始管理人民的日常事务。在这一方面，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丰富了上述武装宣传的例子，他们甚至在游击战略的五点中提到了这一点。

对于消耗战的依赖也促使爱尔兰共和军依靠同情的反英武装力量作为武装自己的主要手段，比如利比亚。这与毛主义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中将敌人当作补给线来保持自身独立性的方法相反。在这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从敌人手中抢夺武器，进而将非武装力量转变为武装力量的原则，是如何远远优于依靠国外资金支持和武器支持的。爱尔兰的斗争一直以这一缺陷为特点，在20世纪2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的前身就依赖于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资金支持并且经常依赖于爱尔兰有产阶级的施舍和恩惠，而不得不非常小心不采取太多社会主义行动来冒犯他们。这种没有以无产阶级利益为首要的民族阵线是非常失败的，实质上是将领导权交给同样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上层阶级。

即使是在这一重大缺陷之下，爱尔兰共和军仍以穷人的支持为主要力量，以民族压迫为跨阶级联盟的基础。失业、种族主义和贫穷成为了爱尔兰共和军招募战士的土壤。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英军无法在军事中战胜爱尔兰共和军，却也一再证明其在政治中一次又一次的战胜了爱尔兰共和军。从国家分裂到《耶稣受难日协议》（译注，即《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订，英国政治的毒刺仍在爱尔兰人民身上，尤其是北爱地区人民，人们不愿投降；随着英国脱欧谈判的进程，武装行动仍在继续，群众造反正在增强。就连许多帝国主义政客也害怕武装斗争的继续加强会达到麻烦的水平。可以说，即使官方已投降，武装斗争仍未结束，因为要求武装斗争的条件从未消失。这遵循革命的普遍规律，源于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与被帝国主义压迫国家之间的矛盾。

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有义务重建自己的党，爱尔兰也不例外，在完成重建党的目标之后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而不重蹈覆辙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动持久人民战争。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特别是在麻烦（troubles）时期的经验，给所有革命者提供的，是对城市根据地的可能性的一瞥。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这些经验必将受到限制，只有置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军事领导下，这些经验才能不受拘束。

爱尔兰共和军的一般教训

在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和历史之中，有用的是城市为主、农村为辅的武装斗争的结合。贡萨罗主席的众多贡献之一就是统一人民战争（Unified People's War）理论，它回答了持久人民战争如何应对特大城市和从乡村被迫迁移到主要城市周边的贫民窟的农村穷人的现代状况的问题。这一理论直接适用于有着人口不断增多的特大城市的第三世界，也适用于帝国主义国家本身，以相反的方式进行斗争，即以城市斗争为主，乡村部分支持城市斗争。虽然爱尔兰没有特大城市，但爱尔兰解放力量几百年来主要在城市进行的战斗，对所有第三世界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者都有客观价值。我们希望对他们经验的研究远远超越我们在这里所完成的。

毛亲自研究迈克尔·柯林斯的生平并非没有道理，这种研究提高了毛对于柯林斯所深化的游击战争的理解。在柯林斯背叛人民之前，他在爱尔兰促进了城市游击战；他了解反情报的价值及其与信息战的联系，他利用小型机动部队来执行行动，他坚持彻底保密性，坚持大胆和非常规的行动。我们现代的怀疑论者可能会对毛对柯林斯的城市游击战技术的研究嗤之以鼻；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努力研究，而不是以这些借口，以便将类似的概念应用到持久人民战争理论中。虽然柯林斯的理论缺乏持久人民战争的视野，但是他的实践已经足够让英国感到恐慌并要求谈判，由于缺乏对胜利的坚持，随后的结果是国家的分裂，这是柯林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错误。与历史格格不入的是，柯林斯和早期爱尔兰共和军发动的游击战争是有合适条件的，但是现在对于人民战争来说，这种条件在任何城市工业国家并不存在，人民战争也比单纯的游击战争更为先进和完善。爱尔兰人民早已证明城市游击战的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长期合法斗争及之后的短期暴动是没有出路的。

关于城市游击队的其他考虑

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下，我们已经开始概述一些正反例和优缺点，以便进一步讨论，我们欢迎不同的意见。我们绝不认为这是一篇深入的研究，因为所举出的三个例子中的任何一个都需要大量的篇幅论述。在全部这些的例子中，事实上，在所有城市游击队的例子中（除了存在于实际的持久人民战争中的那些城市游击队外），都缺乏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某些特征，这必须加以考虑。

军队作为党的群众工作者：人民军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或红军（资本主义国家，要求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社会工作对维持和发展群众联系来说是必要的。这在实际的持久人民战争之外的城市游击队的经验中是不存在的。而普适的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已经解决了维持和发展群众联系的问题。

从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规律出发，毛主义理论主张一种新军队，这种军队主要从事与旧国家斗争，同时也保持在生产中的作用，使其自力更生，防止寄生（于人民）。忽视这一原则会带来灾难，并阻碍城市游击队长期维持战斗的能力。对此的背叛会导致军队或革命力量在政治上投降，在任何情况下，这都会削弱其应对来自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击的能力，而这种攻击使其失去支持，被先进的反叛乱机构所围剿，并对旧国家进行政治妥协，这在本质上必须被理解为投降。

人民战争是分阶段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其自己的运作规律，误解这一点或完全否定这一点都会犯损害革命斗争的错误。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我们举例的所有三个群体都产生了影响，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三个阶段，他们无法相应地作出应对。这是主观的错误，不是革命活动“条件糟糕”的证据。“条件糟糕”的论点是被用来否定武装斗争的笼统的论点，但事实说明了，不正确的战略和意识形态，无论在第三世界或帝国主义国家实施，都注定要失败。图帕马罗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作战战略不能让他们取得成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或任何欧洲城市游击队的例子都是如此。没有人认为所举的例子之中有用人民战争实现的；事实是，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可以从他们各自的结局中拯救这些经验，并且一定是由革命者坚持前进。

与普遍人民战争的谴责者不同，我们必须对群众进行革命抱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共产党能够成为群众的一个巨大杠杆，持久人民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取得成功，就像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一样。我们决不会说可以照搬第三世界的持久人民战争或城市游击斗争的经验，或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打上橡皮图章，取得完全成功。（注：橡皮图章是一种政治比喻，指代某些法理上权力很大而实际权力很小的人或机构。橡皮图章几乎不会否决，或不能否决某些被要求批准的提案。）

我们的论点很简单，也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学习经验和理论，以便创造性地确定和运用无产阶级的军事战略，以适应帝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情况。否认这一点，就是否认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造反的权利，无助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无助于民族解放斗争。从各方面看，合法斗争必须以掩盖和加强非法斗争为目的，这过去一直是列宁主义的一部分，将来也是，甚至更加如此。这一原则暴露了那些

以臆想的“长期合法斗争”为基础攻击将持久人民战争理论应用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人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我们必须警惕各种起义主义教条，认为列宁或毛在这个问题上有完整的观点，认为他们的观点不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事实却相反，当条件发展时，这些伟大领袖的观点也跟着发展，如果他们今天还活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坚持认为帝国主义已经进入垂死状态，持久人民战争是唯一的前进道路。我们必须坚持群众参与革命战争，必须坚持只要斗争正确，小的力量也可以发展成大的力量——这些观点是符合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唯一基本规律的。我们希望把我们在这里写更多的关于这些团体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并将涉及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团体，这是未来的一项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必须为关于持久人民战争的讨论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结语，与对 80 年代城市游击队陈旧的阿瓦基安主义观点的简短交锋

我们在 1985 年出版的杂志《赢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第 4 期中找到了几篇有用的文章，这是一篇笔名为 P·贝克尔的文章，长篇大论地阐述了阿瓦基安派对城市游击队的机会主义观点。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不知道 P·贝克尔的实际隶属关系，他很可能他是美革共的成员，或者与美革共相当的成员。美革共即使不控制杂志的话，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要在美国获得该出版物的副本，就必须通过美革共控制的革命书店。贝克尔的观点才是我们关心的，他的隶属关系比较次要。

在整篇文章中，“恐怖分子”一词被用来形容每个城市游击队，使用这种资产阶级的谴责手段是没有革命根据的，这种手段也确实散发着美革共的腐臭。列宁用这个词来形容他那个时代的各种力量，但作者与这个例子相去甚远。要清楚，恐怖主义只是所有革命者的武器库中的一个工具，对其进行超出战术领域的道德说教是没有意义的。有允许使用它的条件，也有阻止或禁止使用它的条件。就像暗杀和处决一样，将每个使用这些工具的组织统称为“刺客”或“刽子手”是说教的和荒谬的。战术本身并不代表政治组织的主要特征。贝克尔的这种道德化更普遍地暴露了对政治暴力的厌恶，革命暴力有时意味着杀戮，但是将革命组织称为“杀手”是反动的，因此他使用“恐怖分子”一词也是反动的。这同样不是语义学问题，而是一个分析问题，阶级立场以及宣传服务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

一九八五年的文章说：

“恐怖主义路线认为，对帝国主义机构和人员进行武装袭击，一般是主要任务，至少是革命力量从活动之初就必须完成的任务。这些攻击是他们的战略核心：‘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持久人民战争’。” [8]

这句话值得评论，首先，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西欧城市游击队中，从来没有一个声称正在进行“持久人民战争”。作者与阿瓦基安一致，只是尽可能声称这样做时行不通的，这是在反对武装斗争。其次，如果作者确实研究了那些令人畏惧的西欧城市游击队的历史或文件，就会知道这些组织并没有把武装袭击作为出发点，正如我们上文看到的无产阶级左派（Sinista Proletaria），这些团体是在合法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发展到武装斗争的，红军派甚至直言不讳地说：

“在决定进行武装斗争之前，首先经历合法斗争是很重要的。当一个人与革命左派的联系是建立在只想追随最新潮流的基础上时，那么那个人最好是不要开始任何让他以后无法脱身的事。” [9]

作者不仅错误地将人民战争的主张归之于城市游击队，而且还暴露出他甚至不理解应用于中国例子中的人民战争，他认为：

“从战略防御开始，逐步建立一支红军，配合游击队从农村根据地挺进，转入战略进攻，包围城市，建立革命政府。” [10]

这种糊涂的理解，忽略了人民战争有三个阶段，而不是两个阶段，即它依赖于取得双重政权，形

成革命政府，革命政府在解放区作为一个新国家运作，这是在它向城市推进之前的。在贝克尔看来，游击队可以与红军“配合”，而不是作为其附属。也许是由于他忽略了需要精确对待历史上什么是人民战争的问题，就可以简单地将其含义扭曲到无法界定的程度。

当然，根据贝克尔的说法，帝国主义国家几乎从来没有革命形势，因为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阶级不断地被帝国主义的战利品收买！这种观点完全是反毛主义的，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反群众的，它不仅把群众视为妓女，甚至与现实不符。一切接近“存在一个工人贵族占多数的国家”的理论都是反革命的。例如，美国有世界第二大的制造业，这就需要一个庞大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把世界第二多的无产阶级群体斥责为“工人贵族”，这就要求我们停止对辩证唯物主义和理性的一切理解。不需要用统计数据 and 贫困率来证明剥削在美国很猖獗，让这篇文章陷入泥潭，而是要正确地说，如果存在工人贵族，当然肯定存在，那么就必须存在一个更深的、更深刻的、更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贵族们与之保持距离，一个（阶层）的存在离不开与另一个（阶层）的联系。

贝克尔和他的同伴在左翼城市游击队和像爱尔兰共和军这样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划定界限，为了进行这种划界，他只对后者如何获得群众支持或后者是已经存在的群众斗争的延伸作了一些模糊的评论。对于红军派以及利用武装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等团体来说，这种划分是正确的，但是，正如已经详细讨论过的那样，当涉及到红色旅的大部分存续时期时，它没有达到历史评价的水平。

贝克尔坚持认为，爱尔兰共和军错误的战略正是他们被必须捍卫的确切理由，也是将他们从左翼城市游击队划分出来的地方：

“爱尔兰共和军的持久战军事战略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目标——将英国人赶出爱尔兰——也反映了这场斗争的民族性。由于这些原因，它一直能够获得持续的群众支持。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况下，这种（表面上）类似的战术则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些资产阶级无法被“赶出”自己的大本营，必须彻底粉碎。” [11]

自 1922 年爱尔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只要英国人形式上离开，爱尔兰就会自由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反动的。爱尔兰共和国在文化和经济上仍处于英国的主要控制之下，再者，1998 年 4 月 10 日，《耶稣受难日协议》包括英国军队从北爱尔兰实际撤出。任何对情况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应该清楚，这比英国撤军要复杂得多，爱尔兰不可能在分裂中获得自由，如果不在统一共和国成立后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实现民族解放。长期以来，这一直是爱尔兰革命左翼的论点，贝克尔和他的同伴在向其他城市游击队扔泥巴时，坐在了右边。如前文所述，消耗战缺乏人民战争的广度和野心，因此为爱尔兰解放进行人民战争的口号是唯一有革命根据的口号。两个爱尔兰国家都需要被粉碎，把“共和国”纳入这个国家，没有也永远不会实现解放——这就是毛主义所教导的。贝克尔需要的只是理顺城市游击战可以获得和保持群众支持的事实。

贝克尔举了一个“做群众的尾巴”的例子，声称：

“伯明翰[英格兰]群众起义一天，对帝国主义者造成的物质破坏，是他们多年的城市游击战的一百倍” [12]

我们必须挠头，想知道这里所说的“物质损失”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他说的是财产损失，那么很明显，多年以来爆破建筑的总结果要更经济。如果他说的是政治损害——两者的结果是相同的，因为两者都没有党的领导，一个有能力把斗争与夺取政权的长期需求融合在一起的党的领导。我们有的只是美革共一直以来都犯有的一种奇怪的崇拜，那就是在他们的日常组织中坚持合法主义，然后去干预与他们毫无关联的自发反抗。这种态度在贝克尔的论证中得到了体现，他的观点同样犯有未能与反抗中的英勇群众建立联系的错误。右派利用像红军派这样的团体的真正错误来提出比这些团体的错误更糟糕的论点，这是特别可鄙的。我们的考虑，必须基于组织的需要，具体地说，要考虑一种既掌握非法斗争又保持群众联系的组织方式——本质上就是共产党。

不出所料，教条主义者认为，先锋队的作用只是准备，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不能包括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准备：

“对革命者的要求不是让他们退缩到孤立的破坏和暗杀行动中，而是要提高他们自己的能力，在政治上把这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锻造成先锋队本身。” [13]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绝不能来同破坏和暗杀作平衡，二者不是互相排斥的，就像武装斗争条件下的武装宣传与党的建成的意义的讨论一样。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政治上锻造成先锋队本身，这种模糊不清的方案是完全不够的，这主要是因为组织是由人而不是意识组成的，意识本身并不决定现实，而是现实，主要是生产关系，决定意识。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塑造阶级意识和共产党人的主要催化剂，共产党人重建或建立自己的党。通过平衡这两个本来就相互依存和互利的概念，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只不会猎杀的狗，一件比城市游击队的教训更无用的事。

贝克尔和其他人当然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欧城市游击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正在衰落，这是事实，但在这方面并不是只有他们是这样的。所有之前的主要修正主义政党在美国和西欧也都在萎缩，反修正主义的新左翼和新共产主义运动团体也无一例外地在萎缩。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秘鲁人民战争和秘鲁共产党正在具体化毛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衰落和崩溃同时发生的马列毛主义的兴起，这将使真正的反修正主义政党和组织走上发展壮大的正确道路。正如贡萨罗所指示的，必须用这种意识形态来分析而不是谴责。从谴责、冷嘲热讽和蔑视的观点，像贝克尔那样继续下去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毕竟，贝克尔的评价方法并不是马列毛主义的科学，马列毛主义必须描绘出完全不同的图景。许多年过去了，像贝克尔这样的雇佣文人还在做着同样死气沉沉的、主观主义的“分析”，没有抓住造反动派的反有理和仅凭马列毛主义就可以纠正各种城市游击队犯下的历史性错误的基本真理。意识形态比枪支、炸弹或法律更重要。

贝克尔通过故意歪曲红色旅关于阿尔多·莫罗绑架案的路线，企图诬陷红色旅是改良主义，声称他们的唯一意图是破坏天主教民主党和意大利共产党之间的联盟，然而，他的立场不足以理解红色旅将这一策略纳入了他们进攻国家心脏的政策的行为；他们认为莫罗作为天主教民主党的历史领袖以及意大利前总理是一个合适的目标，其广度远胜于确定议会的组成成分。根据红色旅的说法，天主教民主党是“目前的主要敌人”，他们必须被“清算、击败和分散”，绑架策略没有达到这些目标，但却帮助了这场运动的战略，这在增加天主教民主党的内部矛盾方面取得了成功，许多天主教民主党人公开表示或多或少希望莫罗被处决，因为他们担心在红色旅的审问下莫罗会把一些丑闻泼到他们身上——这就分裂了他们的党。（注：这里应该是指天主教民主党内部各派救莫罗还是不救莫罗的分裂，显然相较于红色旅，天民党派阀安德烈奥蒂更希望莫罗被处决）

与红色旅的实际立场相反，贝克尔表示：

“当红色旅为了影响意大利议会的组成成分而处决莫罗时，他们用枪告诉无产阶级的是，‘打击国家心脏’的真正政治内容是让一个党，而不是另一个政治联盟来执政。” [14]

红色旅并不主要对莫罗竞选议会的结果感兴趣，相反，在确定他是最好的目标后，红色旅试图用莫罗的生命来换取革命者的生命。这是红色旅为了审判莫罗的罪行而举办人民法院时进行的一种战术考虑，目的是将政治犯的苦难政治化，并在天主教民主党之间制造摩擦，根据红色旅的说法：

“他深知自己是这个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对帝国主义霸权强加于我国的反无产阶级政策、对生产力的压制、对工人剥削的状况、对整个无产阶级阶层的边缘化和苦难、失业、对天主教民主党发动的武装反革命负有最高责任。”

根据人民法院为武装宣传服务来说，莫罗是一切反人民罪行的象征，因为从形式上来说，他是帝

国主义的头目。在关于交换囚犯的问题上红色旅表示：

“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得到提出，可见，是有两个目标的——把国内矛盾推向极端；——为解决这个问题开辟一条道路。这两个目标都已经实现了。”

红色旅在莫罗选举前的往期公报中总结了他们的对武装宣传的理解：

“在敌人阵营内制造最大数量的政治矛盾[如在主要修正主义者和天主教民主派之间播下分歧]，即将其肢解，使它不能发挥作用；”

“用尚不为人所知但同样重要的斗争方法，为抵抗运动扫清一条道路；

“在各战线上，把先进的阶级阶层组织到党和全阶级战斗组织中去。”

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和贝克尔肤浅的分析是相符的。更进一步地，贝克尔声称，红色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审判和处决资产阶级头目来从根本上改变局面，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策略包含了这样一个真理的核心，即这种行动分裂了一个争吵的资产阶级，这是任何人民战争的一个基本的甚至是普遍的组成部分。贝克尔指责红色旅把范围缩小到少数人身上仅仅是为了取悦群众，他致力于拒绝帝国主义中心的武装斗争，即使是其的有用部分。我们发现，我们与贝克尔之间的一致或共有的政治立场，主要是因为他贩卖毛主义概念，已经在本文中概述了，这只是巧合，不是任何真正的政治统一。

贝克尔声称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这比城市游击队的概念还要庸俗：

“千千万万的群众自己，不仅拿起了最终打击和粉碎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的枪，而且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一种能够通过不会导致以另一种帝国主义剥削者代替这一种帝国主义剥削者的方法指导他们到此的认识。” [15]

多么唯心主义啊！可以说，共产国际的起义战略，特别是迄今为止的一切人民战争，从来没有从千百万群众在武装斗争开始时就必须拿起武器的方案出发。这样的方案将使中国的人民战争只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游戏，秘鲁的人民战争永远不可能从安第斯山脉开始，发展到利马等的贫民窟。许多城市游击队犯下了种种错误，但他们强调了一个被贝克尔掩盖的真理，即武装斗争需要发动才能发展壮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正是毛发表著名声明时所要表达的意思：

“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16]

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必须命令革命者建立或重建党，尽快发动人民战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今天，世界上的毛主义政党和组织正准备这样做，以帝国主义中心城市游击队的经验以及我们阶级历史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斗的经验为基础。这些人今天可能为数不多，但正如毛的乐观主义所正确坚持的那样，将迅速增长，不是在等待中，而是在战斗中，在与阶级敌人的武装对抗到发动武装斗争和人民战争的每一步！

[1] Beck, Chris Aronson. “Strike One to Educate One Hundred,” Chapter 3. 1986. Seeds Beneath the Snow Publication.

[2] 约书亚·穆法瓦德-保罗。《对红色旅历史的几点思考》，M-L-M Mayhem, 2019年6月14日。
<http://moufawad-paul.blogspot.com/2019/06/some-thoughts-on-memory-of-red-brigades.html>

- [3] 同上。
- [4] 奥斯汀红卫兵。《美国毛主义路线斗争会议文件集》，《迈向武装群众的汪洋大海》，2018年。
- [5] Beck, Chris Aronson. “Strike One to Educate One Hundred,” Chapter 10. 1986. Seeds Beneath the Snow Publication.
- [6] 红军派。《城市游击队概念》，第五部分城市游击队。Kersplebedeb Publishing, 2009.
- [7] Coogan, Tim Pat. “The IRA,” p. 420 The Green Book: 1.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 [8] Becker, P. A World To Win Magazine. Issue 4, 1998.
- [9] Smith, J, Moncourt, Andre. “The Red Army Fac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Projectiles for the People.” Chapter 3, Taking Up the Gun. Pg. 98.
- [10] Becker, P. A World To Win Magazine. Issue 4, 1998
- [11] 同上。
- [12] 同上。
- [13] 同上。
- [14] 同上。
- [15] 同上。
- [16]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号。

<https://struggle-sessions.com/2019/10/07/on-the-urban-guerrilla/>